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

吴理财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研究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我国乡村文化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而不断变革。我国现代化探索肇始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先后叠加了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如今的乡村文化,实际上受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乃至全球化的综合影响,成为一种复调的文化。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根源深藏在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经济发展的事实之中,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经济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变迁相统一。乡村文化自身往往很难实现振兴和繁荣发展,必须首先通过发展乡村生产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乡村经济基础的现代化转型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和繁荣发展。

关键词 乡村文化; 中国现代化; 乡村振兴; 乡村经济结构

DOI:10.19992/j.cnki.1000-2456.2025.01.003

基金项目 文化和旅游部委托项目“农村精神文化状况调查研究”(K210951004)

以往关于中国乡村文化的研究,往往就乡村文化来研究乡村文化,鲜有将其放置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分析。事实上,我国乡村文化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而不断变化的,并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而振兴和繁荣发展。

近代以降,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特别是随着工业化的大力推进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现代工业文化、城市文化的强劲冲击下,乡村文化一度成为“落后”的代名词,成为被改造的对象。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域中,中国乡村文化的价值得以重新被发现,人们认识到没有乡村文化的振兴和发展,就不可能加快推进和最终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积极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因而成为加快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一项重大的基础性时代工程。

本文将乡村文化放置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试图刻画其演进轨迹,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分析,旨在把握其变迁逻辑。

一、关于中国乡村文化的代表性分析框架

对于“文化”,至今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定义,对文化的理解往往与人们看待文化的视角或者将其纳入何种关系中来分析相关。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般将文化视为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观念的东西,将它放置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来考察。人类学和社会学通常把文化当作一个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将它放在社会结构或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来分析,探讨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事实上,也只有如此,才能比较好地理解、把握文化,才能对一个社会的文化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乡村文化的分析和研究,亦是如此。

尽管关于中国乡村文化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是就事论事地对乡村文化进行论述,只有少数研究将它置于特定的结构关系之中来考察和分析。其中,对中国乡村文化富有启发性的代表性分析框架主要有“二元结构论”“摇摆的极端化”和“嵌入性理论”等。

李人庆受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概念的启发,建构了“二元结构论”,分析和探讨了中国乡村文化^①。他将乡村文化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形态,将其放置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传统与现代、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双层文化分析架构来考察它的变迁。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其代表作《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概念。前者是指一个社会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后者则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②。李亦园也认为,中国文化结构里有着一套经典性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另外还有一套在民间流行、表现于民俗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大传统的上层士绅文化着重于形式的表达,习惯于优雅的言辞,趋向于哲理的思维,观照社会秩序和伦理关系;而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大多以日常生活所需为范畴,通过口传的生活实践在乡村社会传衍,往往是直接而质朴、现实而功利的。费孝通则认为,尽管农民的人文世界一般属于民间的范畴,但是这个范畴里实则有多种层次的文化,既包括已接受的大传统文化,又保持着小传统文化,有些暴露在“地上”,有些隐藏在“地下”,甚至有些已经进入潜意识,成为“潜文化”^③。在传统中国,大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影响着乡村的小传统文化,而且根植于乡村的小传统文化之中,由此形成了传统中国一元且和谐连续的超稳定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结构。

然而,步入现代化之后,这一大小传统文化同构的文化结构不仅由于不同步的变革而发生分离,而且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伴随着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和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延伸,乡村文化形成了二元的文化结构形态。特别是1949年以后,乡村文化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两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消长。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社会流动、大众传媒等的发展,一方面削弱了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社会基因,使其成为塑造和改变乡村文化的主要力量。

尽管许多关于中国乡村文化的研究,不像李人庆这般明确地提出二元结构的分析框架,但其背后却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隐藏着类似的分析框架:要么将乡村文化视为与大传统文化、上层(精英)文化或国家文化相对应的小传统文化、基层(民众)文化或社会文化,要么将乡村文化视为传统文化的原发地,甚至与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实际上,前者是把文化视为一种纵向的上下结构(实质上是一种空间结构),后者是把文化视为一种历史性的发展结构,也就是把乡村文化视为与现代文化相对应的传统文化或前现代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时间结构)。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处在“结构”(structure)消极位置的乡村文化,往往被当作受动的、缺乏能动性“主体”的文化看待。

这一“二元结构论”,过于强调“大传统”和“小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和乡村传统文化之间的分野,事实上二者之间的边界非常模糊,因此将乡村文化简单地等同于“小传统”或传统文化未必站得住脚。更值得商榷的是,在这一“二元结构论”中,乡村文化是何时被偷换成传统文化(即从一种空间结构的文化转换为一种时间结构的文化)? 又是如何被替换为传统文化的?

赵旭东同样将乡村文化放置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考察,认为“摇摆的极端化”构成了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参照系^④。

近世中国总是在左和右、新和旧、现代和传统、进步和落后、革命和复辟、城市和乡村、拆除和建设等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不停地摇摆,促使其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地造就出与自己差异分殊的对象性存在。这种摇摆的极端化,又特别集中体现在现代意识形态对于乡村文化的改造以及以“复兴”为旗号的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振兴上。赵旭东认为,这种摇摆的根源在于引入了现代性观念之后,对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概念及其假设的彻底抛弃。一开始,在与城市的“科学”与“先进”的强烈反差映照下,人们将乡村文化界定为与现代性相对立的“迷信”与“落后”。于是,包括乡村文化在内的整个乡村都成为代表现代性的新文化或先进文化的改造对象。这种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现代化前一大阶段的历史进程。尽管伴随着改革开

^① 参见李人庆:《乡村二元文化与社会变迁》,见陈吉元、胡必亮主编:《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189-234页。

^② 参见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5页。

^③ 参见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④ 参见赵旭东:《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放,特别是农村改革和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复兴,但是随后展开的大规模的、快速的城市化浪潮,再一次将乡村虹吸、席卷到急剧的城市化之中,大量的农村青壮年逃离乡村,拥向城市,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乡村日益破败、凋敝,沦为“落后”的代名词。然而,当下又出现了新的趋势,那就是从一味地改造转变成为一味地保护,似乎乡村文化全部的东西都成了值得保留下来的历史和传统。如果说彻底的否定是建立在对于过去和传统的无端鄙视之上,那么完全的保护则是由新的知识精英和地方精英共同发动的对于过去和传统的盲目崇拜。

赵旭东所提出的“摇摆的极端化”,较为形象地刻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变迁轨迹。但是,“摇摆的极端化”只是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文化呈现出来的一种变化景观而已,对于其原因尚需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而且,这种“摇摆的极端化”并非如其所描述的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不停摇摆,总体上而言,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文化只是发生了有限的一两次摇摆而已。

刘彦武运用嵌入性理论对中国乡村文化进行分析,提出嵌入性是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性特征。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嵌入主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入乡村文化并引领、影响乡村精神生活,是其嵌入过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何进入乡村文化,是其嵌入机制。在嵌入性分析的基础上,他把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历史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强势嵌入乡村社会,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破除乡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改革开放到2004年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将乡村文化纳入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文化得到一定的回归和复苏,乡村文化与先进文化相持相融。2005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乡村文化快速发展,一方面它与乡村经济、社会、政治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它与先进文化双向耦合,与城市文化统筹发展,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创意农业成为乡村文化融合发展的新业态^①。

刘彦武谈到,经历拒斥、相持、融入、变化之后,乡村文化和先进文化实现了双向耦合,但总体上而言,这个分析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引导作用和决定性影响,将前者视为积极主动的嵌入主体,后者视为被动的嵌入客体。这一分析仍然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与将乡村文化视为大传统文化相对的小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将乡村文化放置在当代中国的场景中进行分析。

关于乡村文化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乡村文化演进或变迁的基本机理。

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一般被视为意识形态,将它放置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来考察:“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析框架,毛泽东说得更加简洁明了,“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③。

尽管人们对于“决定”“反作用”乃至“交互作用”有多种不同的解读,但是,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它始终把经济结构的事实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关系看作一条主线,文化便是沿着这条主线编织起来的,只有理解了这条主线,才能真正理解文化^④。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优势在于能够揭示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本文将乡村文化放置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来分析和探讨它的变迁机制。

二、近代工业化及乡村文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伴随着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的胁迫试图将非西方社会纳入其帝国主义支配体系而

① 参见刘彦武:《中国语境下的文化治理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第170-1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

④ 参见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91页。

做出的一种整体性社会反应。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帝国主义将其现代化模式输入中国，将封建主义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①。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有经济上、政治上又有文化上的，其中文化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西方工业文化的输入。西方工业文化主要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经济）、教育（即新式教育）乃至西方宗教的传播而输入中国，中国文化在西方工业文化的冲击下出现了总体性危机。总体而言，当时的中国文化，还是与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一套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

面对列强侵略，一些先进的国人也将眼光转向西方，主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中国的精英分子首先接受西方工业文化的洗礼，西方工业文化于是在精英阶层中日渐盛行开来。但是，那时的中国基层民众仍然停留在与传统的农耕文明相适应的小农意识水平上，毛泽东等称之为“封建的”文化。民众一方面梦想着均贫富的大同社会前景，另一方面又祈求降真主来实现理想社会，从而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激进且落后的观念，一味排斥西方的工业文化和现代化事物，最终导致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这样一来，就造成当时的精英阶层文化与基层大众文化之间的巨大区隔和鲜明对立，精英阶层引自西方的现代文化观念“象油浮在水面上一样地漂浮在广阔的乡土文化带的上空”^②。

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被推翻，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却因为缺乏相应的社会文化土壤而很快发生异化，并最终失效，沦为各种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买办力量的博弈场。诚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纲纪解纽，“蔑弃道原，全国信仰之中心，摇动失坠”，是共和政体失效的文化原因，“无论何种制度，皆不能植深基于社会，而功用无自发生”^③。

“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在器物 and 制度之后，是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换言之，中西异同，“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所在。本源所在，在其思想”^④。这一文化对立的升级，促成了中国近代观念形态的革命，最终演化为一场激进的新文化运动^⑤。

然而，即便如五四运动这样的影响深远的伟大社会运动，它对当时的基层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影响也不明显。对此，郑振铎曾经说过，“现在的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只是“集中于北京、上海、长沙、天津、杭州、成都、广州、漳州那几个地方”，“其余极多的区域，都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⑥。胡愈之也认为，“吾国一切文化事业与大多数之农民阶级竟若全不相关”^⑦。因而，“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城乡之间不仅交通阻塞而且存在严重的“文化的交通阻塞”^⑧。对于处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中的农民而言，他们所注重者乃家计和家族的事业，以致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就像梁漱溟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家庭，个人淹没在家庭之中^⑨。

传统的小农经济与家族组织乃至儒家思想是相互贯通的。这一点，杨明斋说得很清楚，“农业之历史的经验之创造生活是依靠家族；一切教育知识修身道德秩序也是寓于家族及其环境中”，“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在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不变至二千余年的原因，便是全凭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假使破了这种经济的组织，不用说其法律政治思想道德习惯不适用，并它的伦理恐怕也要去一大半”^⑩。

晏阳初等曾经对小农的“私”大张挞伐，并力行平民教育。事实上，对于小农的这些意识仅仅进行精神的批判是不可能消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② 程歊：《晚清乡土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页。

③ 《梁启超全集》（第9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603、2651页。

④ 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见《远生遗著》（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5页。

⑤ 参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49-350页。

⑥ 郑振铎：《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9号，1920年1月21日。

⑦ 罗罗：《农民生活之改造》，《东方杂志》第18卷第7号，1921年4月10日。

⑧ 《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⑨ 参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3页。

⑩ 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30页。

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①。换言之,“中国二千余年来的政治教育风俗习惯道德人格之高尚败坏,其原因无一不寓在家族的经济状况中”^②,如果这一经济基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其社会意识乃至整个文化都不会有大的改变。

中国乡村一般都是聚族而居,形成蜂窝状的大小村落,“村落家族的人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安土重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生产的发展没有提供个体与群体脱离的条件。相反,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是人们能在一起生活的物质环境的前提”^③。在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家族文化,必然会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稳固的家族文化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力,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不曾中断过的文化。然而,一旦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如果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人口的流动则不可避免,在工厂里就会出现各种工人的团体和组织,这些将会造成社会生活中的家庭力量的削弱”^④,建筑其上的乡村文化也必然发生改变。

中国现代化是从工业化肇始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1949年中国工业经济总体上仍然十分落后。在这一年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⑤。我国近代工业经济不仅发展十分缓慢,而且结构也严重不合理,基本上是外国工业经济占主导和支配地位,民族工业经济非常弱小。除了少数工矿以外,这些近代工业主要分布在都市。城乡发展的严重不均衡以及乡村自身的闭塞、乡村教育的落后,都影响了工业文化对乡村社会的直接作用。总体上而言,我国近代工业文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十分有限,广大乡村人民受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影响更大。

三、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及乡村文化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走的是工业立国的道路,而且以重工业优先。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三年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开始了新中国的工业化,逐步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骨架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工业化初期,没有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不可能有工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建设,宏观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农业则实行“类工业化”的改造,将农业生产按照工业生产的模式组织起来,并从农业、乡村汲取资源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全力支持国家工业化。为了配合这一时期的国家工业化,我国建立了城乡二元分治的社会体制,严格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从工业化本身来看,这一时期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这一时期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乡村之外的城市,乡村则是城市工业的资源供给地。因此,这个时期的乡村文化受城市工业文化的影响基本上是间接性的,它更多地受到与这种工业化战略相适应的以强调为集体和国家做奉献为主题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意识形态看来,传统的小农观念是封建的、落后的,乡村文化也被视为落后的,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造。

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工业化。问题在于,农民是否愿意为此做出牺牲?所以,毛泽东才提出,中国要搞工业化首先要教育农民。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

② 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213页。

③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④ 古德诺:《解析中国》,蔡向阳、李茂增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6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1431页。

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①

因此,早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党和国家就对农民的思想几乎同步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有将一个个的小农切实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才能真正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于是,党和国家持续不断地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政治学习和文化宣传,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构建农民对集体和国家的认同感。

伴随着农村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党在农村基层广泛而普遍地建立了农村俱乐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简称“文艺宣传队”)等文化宣传组织,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寓教于乐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在农村公社还建立了文化站、广播站、电影院、电影放映队、农民业余学校等组织机构,在县一级将民众教育馆普遍地改造为文化馆或群众艺术馆,通过它们实现了农村文化资源的总动员。这些农村文化组织或机构,在集体化时期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丰富农民集体文化生活的的作用。

露天电影和遍布乡村的有线广播构成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乡村文化风景线。1949—1952年,农村放映单位从无到有达到696个,改变了旧中国只有大中城市有电影院的状况,城乡电影放映网开始建立。仅1952年,农村观众就达到1.8亿人次^②。1952年,全国有1110个电影放映队。到1955年,增加到2300多个。1955年,农村电影放映队的观众达3亿8000多万人次^③。1957年,全国电影放映队增加到6692个,1958年又快速增加到8384个^④。1955年,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广播网,“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在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⑤。很快各地迅速掀起建设广播站的高潮,仅一年的时间有线广播就遍及全国。1956年,全国2/3的县(市)有了有线广播站,装设喇叭51万多只,其中80%装在农村^⑥。1958年,全国有线广播站达到6700多个,比1952年的327个增长20倍。其中,农村人民公社广播站5000多个,农村的广播网基本建立起来^⑦。看电影、听广播,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农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和时代景象。

伴随着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开展,党和政府还在农村广泛推进文化教育,扫除文盲。扫盲运动着力于社会主义认同构建,将革命理念渗入乡村日常生活,原本目不识丁的乡村人也由此成为社会主义新人^⑧。文字不仅是文化教育的一部分,在构建和达成社会共识、塑造公共价值观、形成政治认同等方面也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展的扫盲运动,相对于其提高农民识字率和普及知识的目的而言,其政治认同建构功能更为重要。就这个意义而言,扫盲运动包含了鲜明的现代国家建设的内涵。

党在农村的宣传教育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公共精神,形成社会主义的“新传统”。然而,中国毕竟拥有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传统,农民长期作为小生产者,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农民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期间我国试图改变农村传统文化的政策从表面上看似乎获得了较大成功,农村传统文化确实因此而大大减少,但实质上只是由显性存在转变为隐性存在,一些传统信仰习俗仍在不断流传,传统价值观念仍根深蒂固”^⑨。

不少研究也揭示,这一时期国家对乡村乃至乡村文化的强力改造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赵文词(Richard Madsen)通过对陈村的研究,认为即便如“文革”时期,中国乡村文化也绝非浑然一体,而是包含了诸多不协调乃至相互冲突的部分。乡村文化并非被动地接受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些传统文化仍然顽强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⑩。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② 参见林莉丽:《不断提高公益放映影片的供给质量,让农民充分享受到电影改革发展成果——新中国70年农村电影放映发展回眸》,《中国电影报》2019年9月11日,第4版。

③ 《两千三百个农村电影放映队》,《人民日报》1955年12月4日,第1版。

④ 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建设成就统计》,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82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0页。

⑥ 参见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9-200页。

⑦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建设成就统计》,第168页。

⑧ 参见满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1950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

⑨ 黄永林、罗忻:《新中国成立70年农村文化的现代性探求及历史经验》,《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

⑩ 参见Richard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20.

实际上,官方意识形态与乡村传统文化的“融合”,未必就表示国家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已被农民所接受,并进入农民的心理文化的深层结构,只是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应付外在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或政治运动)的一种工具化手段而已^①。人们在正式的组织制度中所依从的是“理”,而在非正式组织制度及现实的人际关系中遵从的则是“礼”。“理”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范要求,是国家法律、政策和制度的综合反映;“礼”是传统习惯、乡俗民约,是人情和面子,它以己为中心反映着差序格局的分位角色。实际上,农民在不同的场合或场域中遵循的文化逻辑是不同的,他们根据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话”,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这两个貌似紧张乃至冲突的文化逻辑在农民身上无缝隙地“融合”在一起。它们也会相互影响,但是要想把它们人为地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只是在不同的场合某种成分多一些或占主导地位罢了。

黄树民对林村的考察也发现,“政府宣传不断攻击祭祖、宗族组织、风水信仰和父权观念,并斥之为‘封建迷信’……这样的政策至多只能在表面上得到成功,或使这些传统习俗化明为暗。家族的连续性,仍是农民生活的重心”^②。尽管他并不否认,在这一时期,“一种全国性的文化”在乡村“明显抬头”,不过,他也注意到,“除了这些重大改变之外……农村生活中,较不为人注意但却相当重要的层面:某些传统信仰及价值观仍不断流传,如孝顺父母、三代同堂的理念、风水、祭祖、重男轻女等等,都是村民每天在生活中都会考虑到的问题。政府试图以高压手段来改变这些传统信仰及习俗,但只有在某些时期有效。政治力量一旦松懈,农民便迅速回到上溯千百年的老路子”^③。其实,葛学溥(Daniel H. Kulp)在对凤凰村研究时就曾预言,随着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到来,中国乡村的家族主义肯定会发生变化,但是家族主义有着自身的防御机能,对于那些来自外部世界的社会制度有着顽强的抵抗力^④。

乡村文化总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变化。根据王沪宁的研究,即便经过激烈的土地革命,人们的家族和宗族观念并未发生巨大改变。经过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农民加入了超家族共同体的集体组织,家族组织才逐渐失去其凝聚力、组织力,最终导致其权威的消解,原来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宗族文化传统逐步走向式微。经过农业合作化改造之后建立起来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进一步抑制了家族的作用,削弱了它的权威^⑤。

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农村结合农村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文化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扫除文盲与生产劳动教育和技术教育相结合、集体生产与移风易俗相结合的方法,对乡村旧文化进行了彻底改造,既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又批判封建专制文化,建设了社会主义新文化。重建后的乡村文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文化特色。

四、改革开放以来叠加的现代化及乡村文化

我国现代化探索肇始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又先后叠加了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大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依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国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发展过程。当今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一叠加的现代化,对乡村文化产生了比之前单一的工业化以及随后的城市化更为复杂的冲击和影响,使如今的乡村文化成为一种复调的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党将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给工业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也为工业发展积蓄了超常的扩张能量。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我国工业产品的更新换代大大加快,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市场的因素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工业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国

① 参见周军:《中国城乡融合进程中农村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79页。

②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前言”第22-23页。

③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前言”第21页。

④ 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周大鸣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

⑤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第53-57页。

家实力显著提升的关键产业。工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在这一进程中,农业农村为我国工业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主要表现为: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和流动出来的大规模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新工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者;还有一批从农业农村中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转型升级,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崛起,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的新主体,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工业经济主体的结构,使之更具韧性和活力;同时,我国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在乡村,农民的工业品需求和更新升级,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工业化的发展。

随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乡村文化也必然受到工业文化越来越大的影响。“旧有的道德,也随着新经济变迁。譬如社会的经济较家庭经济其男女交际之机会多,于是社交易于公开,向来‘三从四德’的道德,便要自然的崩坏。再譬如‘孝为百行之原’的伦理道德,其第一的条件便是‘敬养’,要做到敬非亲自侍奉父母不可;在社会的经济状况之下,如何能像家庭经济可时常在家侍奉父母!于是孝亲的道德也要改其面目。政治法律大部分是维持经济的组织及社会的道德习惯与秩序的;今其经济情形已变,则前之政治法律自然的随之而失其效用”^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我国乡村很快地出现了杨明斋所谈到的这些文化上的诸般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广泛推行以后,农村土地从集体生产重新返回到家庭经营方式。与之相应地,建立在集体生产基础上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很快趋向瓦解。于是,家族乃至宗族的组织随之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农民合作、管理公共事务和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作用。不过,这时候复兴的宗族,并非传统的宗法性宗族,取而代之的是功利性宗族和礼俗性宗族^②。也就是说,经过“摇摆的极端化”之后,乡村文化并非简单地退回到改造之前的状况。

在农村改革之初,恢复重建的宗族组织带有十分明显的功能主义色彩,它是在农村公共组织功能缺失的情况下,村民对于公共物品需求的一个替代性选择。这一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显著。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这一机制就不再显著^③。一旦农民可以离开土地,从事其他的非农产业,人们对于诸如宗族这样的民间组织的功能需求必然减弱。实际上,随着乡镇企业的勃兴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一度复兴的宗族又从功利性回归为礼俗性,并在此基础上演化为一个联系宗亲和乡贤的松散性社会网络,甚至变为一个只是维系乡愁和亲情的情感性纽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大量的农民外出进城务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从原有的村社集体、地缘乃至亲缘关系中脱嵌出来,日益融入现代产业经济体系之中,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着现代工业文化的熏陶。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越来越认同城市工业文化的先进性,认为乡村文化是落后的东西,并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拥抱五光十色的城市。如此,农民“一旦他可以频繁地外出远行……他的视线就会从身边的各种事物中间转移开来。他所关注的生活中心已经不再局限在生他养他的地方了,他对他的邻里也失去了兴趣,这些人在他的生活里只占了很小的比重”^④,并且越来越不重要。于是,邻里关系由此松弛下来,从而逐渐地销蚀村庄共同体。伴随着这些变化,农民的婚姻观念、性爱观念、家庭观念、养老观念乃至整个的生活伦理都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个时候的乡村,已由伦理本位、集体本位的“熟人社会”渐渐演变成舆论失灵、面子贬值、人情淡漠的“无主体熟人社会”^⑤。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电视、电脑、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现代信息技术及其载体、平台与媒介也渐次被引入乡村社会,对乡村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视机开始进入乡村。当村庄只有少量的电视机时,集体看电视成为最受欢迎的公共娱乐方式。进入90年代中后期,电视机在农村已有较高普及率,看电视成为农民日常最主要的娱

① 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251页。

② 吴理财:《宗族与村庄政治》,见肖唐镖、史天健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5-257页;周大鸣、杨小柳:《社会转型与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研究——传统文化、乡镇企业和乡政村治》,《思想战线》2004年第1期。

③ 参见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④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57页。

⑤ 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读书》2011年第1期。

乐休闲方式。不过,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看电视从公共娱乐日渐转为私人娱乐。农民原来热衷的看电影、看大戏等公共性文化休闲娱乐方式开始式微,村庄的公共文化娱乐活动越来越稀少。随着互联网的引入、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如今“玩手机”“刷视频”等大有替代之前的看电视之势。

乡村传统文化的衰落进一步推动了乡村共同体的解体,乡村政治性的集体文化烟消云散,公共性文化让位给私人性的文化娱乐体验^①。农民私人文化生活与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严重失衡,导致当前农民文化生活也出现了严重的“个体化”问题。就像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以“独自打保龄”来形容美国社区生活的衰落那样,当前中国乡村文化生活也出现类似的“独自看电视”“独自玩手机”现象。农民文化娱乐活动的个人化,进一步加剧了农民人际关系的松散和乡村社区生活的衰落。

进入 21 世纪,信息技术成为影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最活跃力量,人们积极拥抱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乡村个体农民的文化生活,大大提升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便利性和可及性,却同时又消解或褫夺了个人的主体性。尽管技术进步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自由时间,却无法消除日常生活的平庸和琐碎,更难以以创造性活动取代日常生活的异化状况。信息化对乡村文化的改变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性的也有消极性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迈上快速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的生长,是工业化这枚硬币背面的图章。没有市场的孕育和生长,工业化可能可以发个芽,但是很难长出茂盛的枝叶,更难开花结果。”^②当今中国,不仅工业化的背后是市场化逻辑,城市化、信息化乃至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依然是资本和市场的逻辑,它们对乡村文化的影响,莫过于其背后市场化逻辑的影响。市场化对乡村的冲击,既消解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也摧毁了乡村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渗透到农民日常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活之中,由内至外潜在地瓦解着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

一是人际关系疏离。农民与农民之间传统的互惠、互助、合作关系日益瓦解。如今,农民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进城务工,都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使得市场及其准则延伸到农民的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人际关系因此变成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农村社区邻里之间传统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农民之间的劳动关系变成了即时性的金钱交易。

二是公共舆论弱化。公共舆论作为乡村社会重要的内生性规范,发挥着维持乡村社会公共秩序和规范社会成员言行的重要功能。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减弱的乡村社会里,村庄公共舆论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各种偏常或失范行为层出不穷。诸如“那是人家的事”这样的村庄公共舆论,形式上似乎趋向尊重他人的个人权利和隐私而显得包容,实则是公共道德力量的消解。

三是伦理道德式微。个体农民不但从乡村集体游离出来,还从传统的家庭关系、伦理道德中脱嵌出来,处于原子化的流散状态,如一盘散沙。在一个快速流动、急剧转型的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是在一种不稳定的、不确定的陌生环境中进行的。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稳固的家庭、社群似乎变得可有可无。

四是公共精神缺失。新一代农民,绝大多数已经不存在任何“公共”或“集体”的意识了——他们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却无视应有的义务与责任,许多沦为“无公德的个人”。诚如阎云翔所观察的那样,它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对于当下农民而言,个人利益远远超过了公共利益,公共事务陷入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自利经济学陷阱之中。

如今的乡村文化,实际上受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乃至全球化的综合影响。今日之乡村文化,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纯粹的农耕文化/乡土文化了,而是一个看似奇怪的杂糅/拼接的文化,实则为复调的乡村文化。

五、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文化振兴

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积极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的基础性时代工程。

把乡村振兴放置在中国现代化探索和推进进程中来考察发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其推行,实则是

^① 参见吴理财、解胜利:《当代中国大众娱乐习惯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② 徐远:《从工业化到城市化——未来30年经济增长的可行路径》,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Ⅶ页。

对我国以往推行单一的工业化或城市化战略的重要调整。单一的工业化或城市化,如果不是牺牲乡村的利益便是不利于乡村的发展,其结果都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城乡人民都要共享改革和发展的红利,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城乡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它既包括城市的现代化,也包括乡村的现代化,是城乡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诚如王先明所言,“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农业、农村和农民居于什么位置,是任其自然萎缩、衰败、淘汰,还是促进其发展、进步和转变;将农业、农村和农民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外,还是将其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将面临的重要课题和难题。前者的后果将使现代化失去稳定的基础和强大的发展动力,后者的结果恰恰相反”^①。毋庸置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必须将农业、农村和农民纳入其中,积极推进乡村现代化。而且,它强调乡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同步、协同和交融发展。

然而,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没有及时跟上来,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仍是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当前我国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的正确判断。也正是如此,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才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积极全面地推进乡村振兴,它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能否顺利达成。

中国式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是现代工业文明(它常常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具体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所代表的则不单单是现代工业文明,它还代表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代农业文明。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农业文明相互交融、共同进步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代农业文明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乡村不是凋敝落后的代名词,完全可以与城市一样,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承载地。我国 14 亿多人口,9 亿多在城镇,近 5 亿在乡村。未来即便是城市化率达到 70% 以上,还将有数亿人生活在乡村,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也向往在居住地就能过上现代生活。因此,顺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坚持不懈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高乡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努力将乡村打造成农民就地过上现代生活的幸福家园,是乡村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应是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相协调的现代化。

乡村生活是人类一种不可替代的、值得珍视的生活方式。与城市不同的是,乡村不仅具有生态涵养和休闲观光的功能,发挥着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蓄水池”的作用,不仅意味着“慢生活”“宁静生活”或“生态生活”,还蕴含团结、互惠、合作、信任、亲情、守望相助等文化价值。尤其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迅速步伐增加了人的向往,向往昔日的较慢的节奏,向往延续性,向往社会的凝聚和传统”^②,这些都是乡村生活方式所独有的价值及其魅力所在。

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都是人类值得珍视的重要生活方式,各自有其独特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城市有城市的特点和优势,乡村有乡村的特点和优势,两者应该共生共荣。只有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齐头并进,才能最终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

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乡土则是中国文化的深沉底色。没有乡村文化的振兴和繁荣发展,就不可能全面推进和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③。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农耕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基因密码,也是新时代提振乡村精气神的宝贵精神财富。全面

^① 王先明:《走进乡村——20 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73-374 页。

^② 斯特维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年,第 19 页。

^③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682 页。

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进一步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积极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①。

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弃旧扬新的过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总是交融在一起。乡村文化振兴亦非简单地返旧去复兴建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耕文明,而是要传承、发扬优秀的传统乡村文化,使之与现代文化相融合,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论是城市的现代化还是乡村的现代化、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其他形式的现代化,最终都是以文化来定义的,文化的繁荣发展才是现代化的最高目标。

责任编辑 曾巍

Rural Culture in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Wu Lica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bstract: China's rural culture has been changing along with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its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ina's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 began with industrialization, superimposed with urban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successivel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ural culture now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market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even globalization, and become a polyphon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the changes in China's rural culture since modern times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facts of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h 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resulting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t is difficult for rural culture to revitalize itself and prosper on its own. A necessary step is to first develop rural productive forces, revitalize rural industries,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economic base, so as to revitalize rural culture and achieve its prosperity.

Key words: rural culture;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① 参见胡春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5日,第6版。